

#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 批判实在论进路

肖雷波,王 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越来越引起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首先,关于它的批判主要有四种:它的非人类行动者问题、非还原论问题、它对社会结构分析进路的忽视及其本体论政治意义的争议。其次,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价值意蕴主要有三点:一是非人类行动者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二是非还原论的强烈意识,三是辩证本体论的生态洞见。最后,针对它们之间复杂关联与分歧,采取批判实在论的进路进行融合是可行的:以超验实在论融合 ANT 的行动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以批判自然主义整合 ANT 的实践建构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以辩证的批判实在论贯通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从而为解决 ANT 的激进经验主义困境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困境提供一条有创见的思路。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马克思主义;批判实在论;后人类主义辩证法;实践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2-0063-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2.009

## A Critical Realism Approach to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rxism

Xiao Leibo, Wang Xi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China)

**Abstract:**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rxist academia. First of all, there are four main critiques about it: issue of its non-human actors, issue of non-reductionism, its neglect of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its ontologic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Secondly, it has three main value implications for Marxist researchers: (1) the initiative and vitality of non-human actors themselves, (2) the strong awareness of non-reductionism, and (3) the ecological insight of dialectical ontology. Finally, in view of the complex relevance and divergence among them, it is feasible to adopt the approach of critical realism into integr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fusion between ANT's action ontology and Marxist practical ontology by transcendental realism,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ANT's practical constructivism and Marxist dynamic reflection theory by critical naturalism, and the penetration between ANT's post-humanist dialectics and Marxist practical dialectics by dialectical critical realism. Thus, it provides an innovative way for ANT's radical empiricism and contemporary Marxism's humanism to walk out their dilemmas.

**Key words:** actor network theory; Marxism; critical realism; post-humanism dialectics; practice dialectics

收稿日期:2021-12-1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哲学重点项目(19ZXA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44)

作者简介:肖雷波(1976—),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STS、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 秀(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目前,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尤其是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研究越来越引起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已成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思潮。2005 年国际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推出以“缩小 ANT 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为主要目标的专刊。2013 年,国际期刊《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则推出“日本 STS 与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专刊。2015 年,国际著名期刊《作为文化的科学》(*Science as Culture*)刊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索普(Charles Thorpe)教授以“融合 ANT 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进路”为核心的文章:《STS 的一种新进路?马克思主义与 ANT 的综合》。2017 年,社会理论期刊《卓越》(*Distinktion*)则刊出哈萨克斯坦塞耶斯(Edwin Sayers)教授聚焦“关于 ANT 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叠与分歧”的《马克思与 ANT 批判:转义、转译与解释》的论文。基于上述这股学术思潮,笔者决定尝试从批判实在论角度深入探讨以对“ANT 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进路”问题予以回应。

### 一、对 ANT 的四种批判

ANT 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最先提出的,它采用“跟随行动者”方法论视角去具体研究人类(如科学家、实验人员、行政人员等)与非人类行动者(如科学仪器、实验对象等)之间彼此建构、共同演进的异质性动态网络的过程。自从拉图尔 1987 年出版的《行动中的科学》著作问世以来,这个理论已成为 STS 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之一,然而 ANT 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总的来看,目前针对 ANT 的批判大致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批判是针对它的“非人类行动者问题”(最突出);第二种批判是针对它的非还原论问题;第

三种批判是针对它对社会结构分析进路的忽视;第四种批判是针对它的本体论政治问题。

#### (一)非人类行动者问题批判

ANT 的非人类行动者(nohuman actant)概念与其主张的广义对称性原则紧密相关。广义对称性是拉图尔借鉴了卡龙的行动者网络概念与布鲁尔(David Bloor)的“强纲领”对称性原则后,于 1992 年在其《社会转向之后的进一步转向》著作中提出的。他将技术的成功或失败同等归功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认为它们之间是完全对称的,拥有相同的建构力量,这完全消遁了人类与自然、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经典认识论模式。韦伯(Max Weber)、柯林斯(Harry Collins)等学者对 ANT 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完全等同并赋予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的符号学做法表示不满,他们对于 ANT 非人类行动者问题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方面,针对拉图尔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问题。ANT 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完全等同并赋予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而这一点与“人类行动者有计划、有目的等意向性而非人类行动者却没有”的常识明显相左,这便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韦伯认为,人类行动区别于非人类的无意识行为在于人类行动明显带有主观意识<sup>[1]</sup>。另一方面,针对拉图尔提出的非人类行动者“代理人(agent)”问题。拉图尔认为,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需要有人,也就是“代言人(spokesman)”替它们说话<sup>[2]</sup>。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则在其著作《实践的冲撞》中,通过他的物理学实例批判 ANT 采用符号学处理非人类代理人问题的做法。在其物理学实例中,科学家积极构造新机器,然后采取被动角色来观察机器捕捉到的物质代理人的表现形式,如果代理人有效地捕捉了预期的非人类行为,则建模成

立。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必须通过人类来作为中介。

## (二)非还原论问题批判

非还原论是 ANT 的一大特点。当进一步追问行动者的解释时,按照因果决定论,往往会诉诸事物的起源。而拉图尔认为,“所有关于起源与基础的研究都是肤浅的。”<sup>[3](P188)</sup> ANT 的非还原论与其主张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转译(translation)”紧密相关。在卡龙与拉图尔看来,转译指的是行动者为征募他人加入到事实建构的网络联盟中,将自身利益转换为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从而使得他们的行为可以控制和预测。但转译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利益协商过程,包括问题化、利益化、征募、动员等阶段,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成就,它不具有还原性。学者们对于 ANT 非还原论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种是批判拉图尔的非还原论立场与 STS 主流理论界的还原论立场的决裂。受库恩(Thomas kuhn)范式理论影响,拉图尔的 ANT 将科学视为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辩证冲撞和情境性建构的文化实践产物,是不能够还原为自然或社会的。正是 ANT 这种对还原论的背叛做法,诸多 STS 学者对此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激烈的批评。斯特劳斯(D. F. M. Strauss)就认为:“ANT 违背了事物具有实在的、天生的性质和方式,即便 ANT 设定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界定或者建构了所谓的自然界性质,即便他能操作一个对象的利益,这个对象也会抵制这样的操作,逃离网络。”<sup>[4]</sup>另一种则是批判 ANT 带有浓厚非还原论色彩的转译概念,即批判科学实践不能通过简单的转译来实现。ANT 转译概念所蕴含的非还原论立场吸纳了柯林斯在 1985 年出版的《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著作中提出的“实验者回归”命题。“实验者回归”命题是指:实验是否成

功,由实验结果是否正确决定,这需要实验者采取重复实验才能得以检验,而实验者能力的大小又需要用其实验的结果进行衡量,如此回归无限循环。依据这个命题,科学实验结果的完全重复是难以实现的,所谓的重复性不过是社会协商出来的产物。因为科学实践过程中规则的应用往往涉及到专家判断,而专家判断内含的默会知识则常常导致规则的应用无法形式化。在卡龙看来,转译分为四个步骤:问题化、利益化、招募、动员,且这些步骤的顺序是不能还原的。

## (三)社会结构分析问题批判

对社会结构的忽视与否定也是 ANT 广受批判的一大特点。拉图尔对社会和结构权力进行否定,他把社会藐视为一个非结构化的网络聚合体,将侧重点倾向于网络的建构与范围,而不是殖民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遗产。这些遗产决定了谁被录取,它们在网络中的影响有多大,使得 ANT 这个理论存在忽视或者压制社会结构、背景、深层原因和系统性的问题。强纲领的支持者柯林斯、耶尔莱(Steven Yearley)和其他批判 ANT 的学者与 ANT 的支持者拉图尔、卡龙之间曾针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认识论的鸡”之争<sup>[5](P307)</sup>,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两点进行展开。

一是针对自然与社会在本体论上的二元对立。柯林斯、耶尔莱沿袭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思想,十分重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相关联的不平等和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并认为社会结构是具有外在的和制约性的特质。他们一方面对 ANT 忽视资本主义、权力和阶级等概念的做法进行批判<sup>[6]</sup>;另一方面则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完全对称性等同的做法归功于“符号学的出发点”<sup>[5](P316)</sup>。“如果整个主题都是符号与表征,就很难准确地知

道我们如何理解自然发生的事物与被制造事物之间的界限。”<sup>[5](P318)</sup>因此,ANT 所采取的符号学做法实际上是将辨别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权力符号化并赋予科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员,却忽略了对自然与社会差异的关注,这不过是逃避问题的权宜之策。另一点则是拉图尔对于社会结构颇具敌意,对众多批判理论者使用资本主义、权力和阶级等概念的阴谋论做法不屑一顾,坚持追踪各个行动者之间的瞬时联系,而不是接受先验社会结构的因果作用。这也是他本人在出版其著作《实验室生活》第二版时将“社会”一词从该书副标题中删除的主要原因之一<sup>[7]</sup>。

#### (四)本体论政治意义的批判

拉图尔认为,ANT 本体论上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会带来政治意义,即“本体论政治”(ontology politics)。本体论政治是指“如果现实被制定,那么现实在原则上不是固定的或单一的,真理不再是接受或拒绝陈述的唯一理由。言下之意,是有各种可能的原因,包括政治原因,来制定一种现实而不是另一种现实,这些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辩论的”<sup>[8](P162)</sup>。例如,拉图尔分析总结巴斯德网络构建的惊人成功例子时,他认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鲜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政治过程,实验室里看似不涉及政治的因素是政治的新元素;疫苗、白炽灯、方程式、污染标准、建筑和血液筛查程序等,这些都是政治实施的新手段”<sup>[9]</sup>。学者们针对 ANT 本体论政治意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观点。

对 ANT 本体论政治意义的批判主要是源于 ANT 所坚持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它强调对称性地对待人类和非人类,主张作为非人类的物也应该作为代表参加政治协商,拉图尔强调人与物之间的权力斗争才有物的议会,物也有发言权,这种本体论上的激进立场常常被描述

为 ANT 对社会理论的核心贡献之一。然而,沃特莫尔(Whatmore)和罗宾斯(Robbins)等学者则认为 ANT 这种本体论上的激进立场无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立场。如,即使坚持诸如洋流等非人类实体的本体论对等,也显然不支持为遭受压迫的人类而进行的解放斗争。伊莱恩·哈特威克(Elaine Hartwick)也指出,其发现非人类行为,如传真机,与工人一样具有积极作用的概念,令人深感不安。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激进”政治?工会传真机?这样对称性原则根本就不会带来本体论的政治意义<sup>[10]</sup>。柯林斯、耶尔莱则提出质疑:“既然扇贝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人类如何与扇贝磋商?如果与扇贝的磋商无法实现,所谓对称地看待人与非人类行动者也不会带来本体论的政治意义。”<sup>[5](P320)</sup>

## 二、ANT 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蕴

学界针对 ANT 主要进行了上述四种批判。不可否认的是,ANT 这一理论自确立和发展以来,其影响力日益深远。正如国际期刊《科学的社会研究》主编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所评论的:“ANT 能否回答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的确是科学技术学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理论成果。”<sup>[11]</sup>如今它早已不仅仅局限于 STS 领域,而是已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旅游学、会计学、城市规划学等各学科领域。ANT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 (一)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生命力

拉图尔 ANT 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行动者”。与之前的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不同,拉图尔所使用的“行动者”能制造差异而改变事物状态,既可以指人类(humans),也可以指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组织、思想等非人(non-humans)的存在和力量,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去

中心化的。

至于为何开始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是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辨别结果是由人类行动者的作用还是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产生的。“现代化的组织、遍布全世界的计算机网络、全球变暖、臭氧层减少,所有这些的出现都是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行动的产物,是二者孪生的结果。”<sup>[12]</sup>

ANT 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一种能动性和生命力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不谋而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是最强大的抽象形态,它与利益密切相关,但是意图、动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服从于某种人类的自治机构。正如经济学家克里斯·麦克莱伦(Chris McClellan)所指出的,ANT 中的“A”描述了理性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所有行动者都是按照利益来进行建构,资本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整合起来,建构起暂时稳定的行动者网络。从资本的重要性到机器的突破性能力,再到机器在改变工作过程中所起的更普遍的作用,以及技术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对 ANT 非人类的描述既继承又超越,因为它区分了非人类的影响和对这些影响的责任<sup>[13]</sup>。

## (二)非还原论的强烈意识

拉图尔 ANT 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非还原论(irreduction)”。在拉图尔看来,曾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每种哲学的主要困境就是平衡物质与关系、行动者与网络之间的永恒需求,而解决它的方式就是非还原论原则。“因为就其自身而言,没有什么东西能还原为或不能还原为别的东西。只有或强或弱的检验(trials)。既不可还原也不可不能还原的东西只有通过检验、计算和测量。没有他法。”<sup>[3](P158)</sup>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强烈的非还

原论意识,与 ANT 高度契合。首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辩证法批判了还原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宇宙中的物质运动分为五种运动形式,即机械、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运动,强调高层形式虽然来自低层形式,但不能还原为低层形式。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常常将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决定文明性质的观点视为一种经济决定还原论,并认为马克思试图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决定历史的因素。这在恩格斯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sup>[14](P109)</sup>。其次,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性的鲜明特征批判了经济决定还原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对于这种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在马克思看来,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因素。”<sup>[14](P120)</sup>

## (三)辩证本体论的生态洞见

ANT 在本体论上坚持科学进入了一种人类与物互动的辩证本体论,在自然或社会系统实践过程中的各个单元地位相同,但不存在优先的权力,以避免自然实在论抑或是社会实在论这两种偏激的极端论断。换言之,ANT 所坚持的这种人类与物辩证互动的辩证本体论在实践上消解了主客二分法的传统做法。正如雷乔·米蒂宁(Reijo Miettinen)所强调的,科学和技术可以被描述为主体通过劳动创造客体世界同时创造自己的过程。这种人类与物共同的历史生成的变化思想也是辩证法的中心方法论理想之一<sup>[15]</sup>。

上述 ANT 从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辩证本体论角度消解实践中的主客二分法的创见对于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也富有吸引力。生态马克思主义家大卫·哈维(David Har-

vey),在他 1996 年出版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著作“辩证法”一章中给出了本体论的答案。对他来说,像“社会”与“自然”、“本地”与“全球”这样的分类意味着已经存在的外部相关的现实领域。他坚持认为,“元素、事物、结构和系统并不存在于创造、维持或破坏它们的过程、流动和关系之外或之前。”<sup>[16]</sup>在这里,社会与自然、人类与自然作为化解本体论分歧过程中的特殊“时刻”,在内部相互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实践基础上推动自然与社会、非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和谐辩证共生,这对解决今天诸多生态现实问题而言无疑是一剂良方。

### 三、ANT 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批判实在论进路

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乔纳森·约瑟夫(Jonathan Joseph)在其《批判实在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五条途径》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存有危机的观点已经流行了好多年。……在这种语境下,批判实在论可以为那些企图既保留马克思主义本质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进行批判的人提供新的希望。”<sup>[17]</sup>针对上述关于 ANT 的四种批判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三点有益启示,笔者决定大胆借助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来融合 ANT 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从而为解决 ANT 陷入的激进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困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人本主义困境提供一个新的应对思路。

#### (一)以超验实在论融合 ANT 的行动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

ANT 是 STS 分析中采用“跟随行动者”策略进行纯粹描述的一种激进经验主义进路,它详述经验的方式像螃蟹式移动,并跨越一系列本体论界限。“它将实体和物质看作是被促动

(enacted)且关系性构成的,并探讨了这些关系的形构与重构。其中所谓的关系性意味着主要的本体论概念(如技术、社会、人或非人)都被看作是效果或结果,而非用以解释的资源。”<sup>[8](P157)</sup>拉图尔在其著作《潘多拉的希望》中以科学家在巴西博阿维斯塔热带雨林(Boa Vista rain forest)的边界从事研究工作为例说明。这些科学家最先在热带雨林和草原的交界地带做标记并打孔,再从适当的深度取出土壤样本,并将其放入土壤比较仪中,然后将其带回实验室研究,运用各种检验工具以获得相关数据,从而形成最终论文。这就是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个完整流程<sup>[18]</sup>。因此,从本体论来看,ANT 主要表现为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不断来回移动的行动本体论,它有三个主要特征:目标导向、异质性共生、转译。它的目标旨在描述“正在行动的科学”,其异质性共生是指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缠绕互动,而转译是指网络的建构者吸引其他行动者,为其他行动者的兴趣提供新的解释,使其加入网络的构建,并引导其注意力以便控制其行为,从而达到趋同。转译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和突现的,所谓的原因自身其实都是协商处理争论的结果,从而以转译模型替代传统的经典因果模型<sup>[19]</sup>。

与之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上主要表现为实践本体论或实践的物质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它不仅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即实践的方式去解决物质第一性的问题,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sup>[20]</sup>一般而言,它具有实践性、关系主义和目的性因果模型三个特征。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性的关系特征,结合目的性,对经典因果概念进一步丰富,认为行动者在实践活动的因果关系过程中,包含了目的性,常将因果论和目的论在一定过程中结合起

来,而不是简单地将二者单向还原。

批判实在论在本体论维度上,是以一种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又称分层涌现本体论)的立场整合了ANT的行动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拒斥经验主义的扁平本体论、实证主义肤浅的本体论还原主义以及所谓“恒常法则”的经典因果关系模型。所谓超验实在论是指世界是具有分层结构的,而非扁平的和单一的,各个层级之间是不可还原的,具有分层结构性、涌现性(emergence)和因果机制三个特征。分层结构性是指超验实在论中提出了三个层面<sup>[8](P158)</sup>:经验域(the empirical,即经验中所出现的现象)、实际域(the actual,即权力或结构一旦被激活所引发的行动)<sup>[8](P158)</sup>和真实域(the real,即那些早已存在的结构和权力,不论这是否可见或激活)<sup>[8](P158)</sup>。涌现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来自低层面的特性,但事物的特性不能由低层面的特性预料,也不能还原成低层面的特性。因果机制是指在一个体系中事物本身存在各种机制,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也存在多种机制,这些机制之间相互影响,构成因果,从而使事件得以发生。

显然,ANT行动本体论强调对称性地对待人类与非人类并追踪描述它们不断重塑结构的瞬时涌现联系,却否定承认社会结构或机制的作用和权力,实际上它是一种缺少深度且只关注可见经验现象的经验主义建构实在论。“ANT不像某些类型的社会建构主义,它对于外在实在的存在也是实在论者。独立于我们的存在(out-there-ness)可能被建构,但它仍独立于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sup>[21]</sup>批判实在论的经验域恰恰关注可见的经验现象,其实际域则恰恰是ANT的实践建构过程,而其真实域则关注ANT那个独立于我们意识的外部存在,则很好地将ANT纳入其核心主张中。

同样,针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批判实在论首先区分及物领域(the transitive,相当于知识使用中的理论和术语)和不及物领域(the intransitive,相当于知识对象),接着认为及物知识是社会建构和可在实践中修正,其权威性和真实性无法完全保证,因为其理论将在实践中被反驳,并被其他理论所取代。这实际上是主张用实际域中的实践建构和真实域中的因果机制去融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物质本体论”中的“实践”观点,认识到特定事件的实际发生,往往是几种因果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践结果,这些力量既可以相互加强,也可以相互抵消。同时,不及物知识是关于真实域中那些早已存在的结构、权力和因果机制,与可见或激活无关,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结构的各种机制,我们就能指出经验背后的驱动力量。这样一来,也就能够以较为稳妥与保留的方式来评估我们计划与行动有哪些可能性、可行性、不足与局限”<sup>[22]</sup>。这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物质本体论”中“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并能为人类的意识所反映”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 (二)以批判自然主义整合ANT的实践建构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

在认识论维度上,批判实在论持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反二元论立场,既坚持了ANT的实践建构论,也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

与主体反映客体的表征反映论相对立,ANT的实践建构论强调所谓的主体与客体二分是人为事后纯化的虚假结果,相反,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辩证互动关系。拉图尔指出:“既然一场争论的解决是社会稳定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社会去解释这场争论是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我们应该对称性地考虑征募人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的努力。”<sup>[23]</sup>于是拉图尔提出了一个反对二元论并对称性考虑征募人

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该原则认为,人类与非人类都作为无差别的行动者,无所谓主体或客体,它们在真实的实践网络中辩证互动,最终建构了科学事实,而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是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观点。它强调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辩证运动,认识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积极主动的能动反映与改造,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变成认识主体的一部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互为前提和互为中介,推动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

批判自然主义是一种强调社会与个人互相影响、共同演化的辩证关系的转换模型。“批判自然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反对传统的个体论与整体论的单一视角,主张将方法论上的个体、整体相糅合,强调二者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或整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人(行为者或个体),而个体通过其行为转变、再造新的社会;个体与整体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实在,填补起社会与人的裂缝,成为社会与个体的联结点,将结构与行为者合为一体。”<sup>[24]</sup>这种观点既融合 ANT 实践建构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又吸纳了马克思主义能动实在论的实践观点,为个人与社会、结构与行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出路。

### (三)以辩证的批判实在论贯通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

在方法论维度上,巴斯卡以辩证的批判实在论(dialectic critical realism)融合了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以非同一性、否定性、总体性和有改革能力的实践范畴替代了 ANT 和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同一性、否定性和总体性的范畴,从而提出了“实在的缺失或否定”概念,指出实在的缺失或否定具有优先性,并从这个角度对辩证法进行了新的界定。非同一性是指:“它最明确的表现

为他异性、纯粹的他在,不管它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不管它是可认知的还是不可认知的。”<sup>[25]</sup>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是笔者基于皮克林对 ANT 辩证法观点的表述,是指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都是在可见的动态网络中共时性互动存在,对传统的二元论进行了尖锐批判,拒斥了表象的反映,关注的焦点不是孤立的科学或技术,而是整个实践网络中辩证互动的各个行动者,体现了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特征,从而走向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生物在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sup>[26]</sup>,这明显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历史性与变化性的辩证法原理,一切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行动者的实践改变了事物的状态而有其相应的辩证模式。实践活动是其他全部活动的前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行动者的实践,使人与人构成了社会关系,人的异化状态在实践中逐渐被扬弃。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辩证法的辩证否定性思维消解两极对立、对还原论思维进行了扬弃,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以实现从解释到改变世界的解放与自由图景。

巴斯卡立足于辩证的批判实在论的角度,贯通了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贯通的依据是“非同一性”概念和“缺失”概念,以此来重新组合非同一性、否定性、总体性和有改革能力的实践辩证法系统,企图实现解放与自由的可能性,来达到辩证的批判实在论的解放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包括三条规则:对立统一(其中包含同一性)、量变到质变及否定之否定。巴斯卡在其批判实在论框架中,大胆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重要规则,并将非同一性、否定性、总体性和有改革能力的实践四个要素吸纳进他的辩证法。于是巴斯卡的辩证批判实在论便拥有作为



“伟大松土机”的辩证结构、经验上“开放的纹理构造”、结构性流动与交互等特征<sup>[27]</sup>。

同样,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和 ANT、马克思主义都秉持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法取代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所谓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是指事实和价值属于两个领域范畴,事实领域是客观范畴,以客观检验真假。而价值领域是主观范畴,是人基于需求对善恶和美丑等主观意识层面的评价。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使得事实和价值被严格区分开来,那么就涉及到了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法,因为事实和价值是相互纠缠的。布朗(Andrew Brown)认为,在辩证法的助推之下,一个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在论者会赞同,一旦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同一化,批判实在论所运用的概念,如分层结构、因果关系、趋势、涌现以及思维与客体之间的区别才会得到支持<sup>[28]</sup>。

#### 四、结语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 STS 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但它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诸多批判。批判的焦点集中体现在 ANT 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在社会结构问题上产生的对立。ANT 采用“跟随行动者”方法论去经验描述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辩证互动的可见实践过程,明确拒绝使用社会、权力、结构之类的宏观概念作为先验的解释资源,主张一切都在实践中瞬间产生,结果走向了激进的经验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决定作用,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这无疑阻碍了 ANT 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的互补融合。但不可否认的是,ANT 的一些创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极有帮助,主要有以下价值意蕴:一是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生命力;二是非还原论的强烈意识;三是辩证本体论的生态洞见。而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困境主要集中体现于“虚假的总体性”概念上,缺少达成总体性的交互主体实践思想。针对 ANT 的激进经验主义困境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困境及其之间的复杂关联,笔者大胆采取了批判实在论的实践角度来尝试解决:以超验实在论融合 ANT 的行动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以批判自然主义整合 ANT 的实践建构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以辩证的批判实在论贯通 ANT 的后人类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这为调和 ANT 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 [参考文献]

- [1]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22.
- [2]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 [3]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 D·F·M·斯特劳斯,张浩军.介于还原论与一门非还原论的本体论之间的形而上学[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0-48.
- [5] [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6] Tom Mills.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Reassembling Sociology after Latour[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69(2): 286-305.
- [7] 常照强,王莉.当 ANT 遇上历史唯物主义——追问拉图尔反批判误区的根源[J]. *科学与社会*, 2020(3): 66-80.
- [8] John Law. *After Method*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9] Edwin Sayes.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Mediation,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J]. *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17, 18(3): 294-313.
- [10] Ben Fine. *From Actor-Network Theory to Political E-*

- economy[J]. Policing and Society, 2005, 16(4): 91-108.
- [11] [加]西尔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M].许为民,孟强,崔海丹,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96.
- [12] Michel Callon, Bruno Latour.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 A Reply to Collins and Yearly[A]//Picking A, (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347.
- [13] Edwin Sayes.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ethodology: Just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Nonhumans Have Agency?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4, 44(1): 139-140.
- [14]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 [15] Reijo Miettinen. The Riddle of Things: Activity Theory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as Approaches of Studying Innovations[J]. Mind, Culture & Activity, 1999, 6(3): 170-195.
- [16]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M]. Oxford: Blackwell, 1996: 49.
- [17] [英]乔纳森·约瑟夫.批判实在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五条途径[J].强东红,陈春莉,译.求是学刊, 2007(3): 18-24.
- [18] 刘鹏.科学实践哲学:内涵、根源与意义[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36-44.
- [19] 肖雷波,蔡仲.回到真实的物质世界:皮克林与拉图尔的比较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2): 98-102.
- [20] 马德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J].求索, 1997(4): 64-69.
- [21] Dave Elder-Vass. Searching for Realism,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Actor Network Theor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8, 59(3): 455-473.
- [22] Freddy Winston Castro. Explaining Society, 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J]. Acta Sociologica, 2002, 45(3): 246-250.
- [23]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8.
- [24] 殷杰,安簏.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兼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第三条进路[J].哲学研究, 2007(9): 99-102.
- [25] Roy Bhaska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M]. Verso, 1993: 231.
- [26] Friedrich Engels.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uhring (Classic Reprint) [M].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New Yor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95.
- [27] Nell Curry. Critical Realism: Beyond the Marxism / Post-Marxism Divide [A]//Andrew Brown, Steve Fleetwood, John Michael Roberts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C].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21.
- [28] Andrew Brown. What Contemporary Marxism Can Learn from Critical Realism [A]//Andrew Brown, Steve Fleetwood, John Michael Roberts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C].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7.